

战时西北国际交通线： 中苏携手反法西斯的国际“生命线”

□ 陈 櫓

在全面抗战初期，西方列强对日本侵略行径采取绥靖政策，苏联是首先向中国反法西斯战争提供援助的大国，苏联的援助对中国抗战起到了雪中送炭的作用。在当时中国通往外部的交通线几乎完全断绝的情况下，与苏联联系的西北通道成了中国与国际联通的唯一通道。这条战时西北国际交通线既是一条反法西斯的国际“生命线”，一度也成为关系到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生命线”。

中苏为抵抗日本法西斯携手开辟的国际“生命线”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了中国东北，之后又不断对中国华北地区进行渗透和蚕食，同时也觊觎苏联的远东领土。陷入经济政治危机和孤立主义困局中的欧美列强，对日本日益扩大的侵略行为采取姑息绥靖态度，不断退让妥协。而直面日本侵略的中苏两国，面对共同的敌人，开始携手合作。苏联的战略重心在西部，要应对德国法西斯更严峻的挑战。为避免两线作战，苏联在远东一方面尽力安抚日本以避免正面冲突，另一方面则支持中国抗战以牵制和消耗日本。1936年11月在获悉德日《反共产国际协定》中专门针对苏联的秘密附件内容后，苏联感受到了援华抗日的紧迫性。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奋起抗战的中国急需国际援助，欧美列强对此都置身事外，苏联则明确支持中国，迅速与中国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开始以秘密运输武器装备、派遣军事顾问及技术专家和志愿飞行员等方式，大规模援助中国。

西北国际交通线便是在这种危急形势下，由中苏两国人民携手在大漠戈壁开辟的共同反对日本法西斯的国际“生命线”。当时中国西北地区地质地貌情

况复杂，政局与社会纷纭变幻，筑路条件和航空站建设条件极为艰苦。为建设和运营维护西北国际交通线，中苏两国动员了大量人力物力，特别是西北地区各族人民为此付出了巨大牺牲。

二战期间，苏联援华有海上路线、航空路线、陆路运输线三条路线。海上路线从黑海港口敖德萨或塞瓦斯托波尔港出发，经土耳其海峡、苏伊士运河、红海、印度洋，到英国殖民地缅甸仰光港再转陆运，或穿过马六甲海峡到法国殖民地越南海防港和英占香港，再转陆运。但此线路途漫长复杂，易受干扰阻拦，在日本封锁中国海岸、英法不时切断输华路线的情况下，海上路线在苏联援华过程中的实际作用极为有限。航空路线从苏联阿拉木图到迪化（今乌鲁木齐）、哈密、兰州，再至中国各地。陆路运输线从苏联阿拉木图附近的萨雷莫泽克到中国境内的霍尔果斯，然后经迪化、哈密、安西、肃州、凉州、兰州，全长2925公里。苏联主要通过后两条线路援华抗日，这两条线路被称为西北国际交通线。

国际“生命线”上苏联对中国的军事援助

从1937年全面抗战开始，到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为止，中国抗战的80%外援来自苏联，而这些援助的90%是通过西北交通线运输到中国的。

在约4年的时间中，苏联通过西北国际交通线向中国运送了大批武器装备，根据各种统计，其中包括各类飞机约1000架、火炮1000多门、各类汽车约2000辆、坦克82辆、机关枪近万挺、步枪5万支、炸弹炮弹约200万颗、子弹超1.7亿发，还有许多飞机、汽车、枪炮的零配件。

通过西北国际交通线，苏联向中国先后派遣了大批军事顾问和军工专家，这些顾问和专家分布于中国的中央军事

机关、各战区和各军兵种之中。苏联顾问和技术专家具有较高的理论素养和实战经验，苏军著名统帅朱可夫、崔可夫，曾通过西北国际交通线先后来华帮助中国抗战。苏联顾问和专家在战略谋划、战场指挥、军队训练诸多方面，都发挥了重大作用。

此外，大批苏联空军志愿飞行员通过西北国际交通线秘密来华参战，为中国抗战作出了重要贡献和重大牺牲。不到4年时间有2000多名飞行员先后来华，他们共击落、击伤、炸毁日机1000余架。他们与中国空军战士并肩作战，在南京、南昌、武汉、兰州和西南后方保卫战，以及支援徐州会战和桂南会战中，都有重要贡献。尤其是在对日军台湾松山机场和汉口机场的几次奇袭中重创日军，作用巨大。其间，共有236名苏联空军志愿飞行员在中国牺牲。

总的来看，通过西北国际交通线运输的苏联武器，多为当时苏军现役先进装备，有些飞机是直接生产线上开出，试飞后交付中国，有些机型在当时属于世界先进之列。来华的苏方人员，也都普遍表现出了良好的军事专业素养和道德品行，受到了中国政府和民众的广泛好评。他们的优异表现和感人事迹，构成了两国长期睦邻友好关系的宝贵精神资源。

中国通过国际“生命线”向苏联输送急需战略物资

苏联援华以向中国政府提供贷款的方式进行计算，中国则以农矿产品偿还援助。1938年3月、7月和1939年6月，苏联先后三次共向中国提供了2.5亿美元贷款。为偿还苏联援助，中国通过西北国际交通线向苏联提供了大批军工生产急需的特殊金属钨砂、钼砂、锌砂、锡、汞、镭。在当时世界已探明的矿产品中，中国的钨、镭储量和产量均

居世界首位，这些特殊金属是军事工业生产中必不可少的。

为了获得这些矿产，纳粹德国曾经极力拉拢国民政府，为此向中国提供了许多优质武器，还派遣了许多极富军事素养的高级军官来华训练，帮助指挥中国军队。只是由于日本方面的强烈抗议，德国才忍痛割断了与中国的联系。当时苏联国际环境非常恶劣，因此特别注重发展军事工业，非常渴望从国际市场获得上述矿产。早在全面抗战爆发前，苏联就曾提出以现款购买中国的这些产品。1937年8月《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在南京签署的当天，苏联政府就致电驻华大使，希望得到这些矿产。在随后中国代表团与苏方在莫斯科的谈判中，苏方继续坚持这些要求。从中国获得的这些产品，使得苏联得以大大优化其军事工业，对于其后打败德国法西斯发挥了重要作用。除矿产品外，中国还向苏联提供了茶叶、桐油、猪鬃、生丝、茶砖、羊毛、驼毛、羔皮、棉花、干果等农产品和大量的牛、羊、马等牲畜。中国向苏联提供的这些急需战略物资，在改善苏联军民生活和生产的同时，还大大补充了苏军的前线供应。

苏联通过西北国际大通道支持了中国的抗战，中国在配合苏联战略牵制和消耗日本的同时，也同样在物资上帮助了苏联。因此，在世界反法西斯事业中，中苏两国是相互支持和相互帮助的战友。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讲，“烽火岁月，苏联向中国提供大批武器装备，中国也向苏联输送急需战略物资，两国携手在大漠戈壁开辟出一条国际‘生命线’，为支援彼此反法西斯战争发挥了重要作用”。



（上接1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人与人和谐相处，社会才会安定有序。维权和维稳的目标是一致的，维权是为了人民，维稳也是为了人民，对于广大人民群众来说，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是最重要的公共产品，没有安全和稳定，一切都无从谈起。要从人民群众的整体利益、根本利益、长远利益出发统筹做好维权和维稳各项工作，正确区分和处理绝大多数群众的正当维权行为和极少数人员的扰乱社会秩序行为，绝不能把政府维稳和群众维权对立起来，既要着力解决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又要着力引导群众正确处理各种利益关系、理性合法表达利益诉求，营造安定团结的社会氛围。

从治理方式看，法治是做好维权和维稳工作的共同准则。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法律是治国理政最大最重要的规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无论是维权工作，还是维稳工作，依法办事都是基本要求，只有维护法律法规严肃性权威性，坚持在法治轨道上平衡社会利益、调节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依靠法治解决各种矛盾和问题，才能确保我国社会在深刻变革中既生机勃勃又井然有序。信访工作作为严肃的法定行为，有严格规范的程序和规则，需要强化法律在维护群众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中的权威地位，正确区分和处理群众合理合法诉求和不合理过分要求，依法依规维护权益、化解矛盾、防范风险、保障秩序，确保群众合理合法诉求依照法律规定和程序就能得到合理合法的结果。

从治理效能看，维权和维稳工作要紧密结合、形成合力。一个好的社会，既要充满活力，又要和谐有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治理是一门科学，管得太死，一潭死水不行，管得太松，波涛汹涌也不行，要讲究辩证法，处理好活力和秩序的关系。维权和维稳统一服务于社会治理大局，不是割裂的，更不是对立的，必须实现相互协调、动态平衡。在推进社会治理工作中，面对可能影响社会稳定的矛盾问题，不能简单依靠打压管控、硬性维稳，而要重视疏导化解、柔性维稳，动员各方力量共同参

与，强化双向协同发力，既通过维权消除风险巩固维稳，又通过维稳发现问题促进维权，推动维权和维稳密切配合、提质增效，不断增强社会治理的预见性、精准性、高效性。

从治理着力点看，维权和维稳的重心在基层，基础也在基层。推进改革发展稳定的大量任务在基层，推动党和国家各项政策落地的责任主体在基层，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性工作也在基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使每个社会细胞都健康活跃，将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将和谐稳定创建在基层。无论是维权工作，还是维稳工作，抓末端、治已病是被动的、应对的，抓前端、治未病是主动的、积极的，重“治”更要重“防”，必须突出抓基层、强基础、固根本的工作导向，为更多资源和力量用在基层和前端，强化关口前移抓源头治理、重心下移抓基层治理，打通服务群众、化解矛盾、保障稳定的“最后一公里”，做到预防在前、调解优先、运用法治、就地解决，以基层基础的坚实稳固为首都稳定和全国稳定保驾护航。

强化责任担当，以信访工作高质量发展支撑服务社会治理大局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工作和信访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关于健全社会治理体系等一系列部署要求，聚焦推进社会治理的重点任务，坚持守正创新，注重系统集成，积极探索实践信访工作服务保障社会治理大局的新模式新路径新手段，为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作出更大贡献。

着力推进系统治理。做好信访工作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运用系统观念部署推进信访工作，加强整体谋划、系统布局，注重上下贯通、左右协同。坚持党对信访工作的全面领导，主动把信访工作作为党的社会工作的重要内容，找准工作结合点切入点，聚焦新兴领域党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等重点任务，健

全完善融入社会工作、服务社会治理大局的制度机制和办法措施，在业务协同、资源整合、力量联动上持续用力、形成合力，发挥“1+1>2”的综合效应。加强各级信访工作联席会议机制建设，发挥联席会议办公室作用，强化成员单位“系统抓、抓系统”责任，推动各级信访工作联席会议机制全覆盖、运行实体化，切实履行好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职责，贯通矛盾源头预防、协调处理、化解处置全链条，进一步推动形成党委统一领导、政府组织落实、信访工作联席会议协调、信访部门推动、各方齐抓共管的信访工作格局。

着力推进依法治理。《信访工作条例》自2022年5月1日实施，这是信访工作历史上第一部党内法规，为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提供了制度保障。围绕群众每一项诉求都有人办理、都依法推进，紧盯“五个法治化”“四个到位”，深入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这一重大改革，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规范工作、维护权益、保障秩序。坚持受理部门负责程序推进，认真登记群众信访事项，规范界定受理范围，对受理信访事项严格审核、分类把关，做到依法受理、精准告知、及时转办，以程序规范到位保障实体问题解决。坚持办理部门负责实质解决，打通法治化“路线图”，完善职能部门“导引图”，区分诉求类型依法分类受理，严格处理、复查、复核三级办理程序，推动依法处理问题、实质性解决群众诉求。坚持信访工作行为和群众信访行为“双向规范”，狠抓业务规范化建设，聚焦“四应四不”问题，完善信访统计、通报、督办、考核工作，运用日常督办、专项督查、业务评查等方式，精准履行提出“三项建议”职责，压紧压实信访工作责任。加强群众法治教育，引导群众更多通过法律程序定分止争，着力破解“信访不信法”等突出问题，坚决纠正卡卡堵堵群众正常信访活动行为，依法处理信访活动中滋事扰序等违法问题，营造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环境。

着力推进源头治理。做好信访工作的最好办法，就是把问题化解在萌芽，把矛盾消解于未然，必须坚持和发展新

时代“枫桥经验”，最大程度把矛盾问题化解在基层和初始阶段。完善源头治理制度机制，发挥县乡两级信访工作联席会议统筹协调作用，落实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和领导干部接访包案制度，健全源头防控、排查梳理、纠纷化解、应急处置的社会矛盾综合治理机制，推动矛盾纠纷发现在早、防范在先、处置在小。用好源头治理平台阵地，依托各级综治中心、党群服务中心等平台，发挥网格化管理服务作用，畅通群众诉求表达渠道，注重与调解、仲裁、行政复议、诉讼等有机衔接，完善社会力量参与矛盾化解的制度化渠道，形成信访联解、矛盾联调、工作联动的整体合力。强化源头治理协调联动，弘扬“四下基层”优良作风，深入推进信访问题源头治理，推广应用党建引领“接诉即办”等行之有效的新时代“枫桥经验”，推动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常态化制度化，把党的优良传统和现代科技手段结合起来，提早发现苗头性、倾向性问题，提前介入矛盾协调处理，切实提升矛盾风险源头预防化解水平，努力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

着力推进专项治理。近年来，信访工作高质量发展取得了明显成效，但仍存在一些突出问题和难点瓶颈亟待破解，必须狠抓突出问题专项治理，提升信访工作整体效能。持续抓好重复信访治理，建立健全滚动排查、定期梳理、持续化解的工作机制，以实质性解决问题为核心，坚持“三到位一处理”，运用法治教育、经济诱导、道德教化、心理疏导等方法，对症下药、精准施策，真正做到“案结事了人和”，推动信访积案随有随清、重复信访持续下降。持续抓好突出矛盾化解攻坚，压实属地责任、部门责任和领导责任，总结运用双交双办、提级包案、专项督查等经验做法，扎实做好矛盾化解、情绪疏导、困难帮扶等工作，注重从政策层面批量解决群体性问题，确保矛盾不升级、风险不扩散。持续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强化未雨绸缪，精准分析信访矛盾风险动向，及时防范化解各类矛盾问题，消除风险隐患，切实提高科学预测、综合研判、主动防范的能力水平，全力确保社会大局安全稳定。

第二次世界大战深刻改变了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确立了以联合国为核心的战后国际秩序。二战胜利80年后的当今世界，单边主义抬头、地缘政治冲突加剧，严重冲击国际社会在二战问题上的基本共识，迫切需要坚持并弘扬正确二战史观。坚持正确二战史观就是要将尊重历史事实作为根本前提，反对任何形式的历史虚无主义，坚定维护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塑造并传播关于二战的完整集体记忆，以史为鉴共创未来。

尊重历史事实是坚持正确二战史观的根本前提。就二战起点这个基本史实来看，要充分认识九一八事变揭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序幕的标志性意义。1931年9月18日，中国打响了反抗日本侵略者的第一枪，开辟了世界上第一个反法西斯战场，并成为二战中开始最早、持续最久的战场。对此，英国学者安德鲁·布坎南明确将九一八事变作为二战的起点。就中国和苏联在二战中的作用发挥来看，中国、苏联分别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亚洲和欧洲主战场，是抗击日本军国主义和德国纳粹主义的中流砥柱，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决定性贡献。中国战场以14年抗战牵制日本陆军近70%的兵力成为二战东方主战场，牛津大学拉纳·米特教授指出，“孱弱的中国在二战中发挥了无可比拟的作用”。英国著名军事史学家李德·哈特的研究证实：苏联所在的欧洲东线战场是承担纳粹德国军事重压的欧洲主战场。就二战性质来看，要充分认识二战不仅是反法西斯战争，也是革命战争、独立战争。剑桥大学方德万教授指出，“二战不只是反法西斯战争，也是革命战争”“从全世界角度看二战，必须包括东亚国家的经验，中东、非洲、南美国家的经验”。这些历史事实不能也无法抹杀，是坚持正确二战史观的根本前提与核心要求。

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是坚持正确二战史观的迫切任务。当前的历史虚无主义，不再以简单否定历史事实为特点，而是通过选择性记忆、模糊价值判断等方式混淆视听。西方关于二战的历史虚无主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西方中心主义。“英美国家的叙述是以欧洲为中心的，提出‘二战’这个词的是美国总统罗斯福，把这场战争与爆发在欧洲的一战联系起来，赋予它一种道德含义”，在此影响下，产生了“1939年德军闪击波兰作为二战起点”等西方中心主义错误论断，这些观点漠视中国自从1931年便开始独立抵抗日本法西斯、苏联战场的重要意义等历史事实。二是全球史叙事中的“东方战场边缘化”。西方话语中长期存在低估中国抗战战略价值的论调。美国历史学家约翰·基根认为中国战场是“边缘战场”，类似的“中国战场是配角”等错误观点屡见不鲜。三是存在“解放者叙事”的意识形态滤镜。二战后的意识形态分歧，导致西方强调“英美解放欧洲”等二战叙事，夸大英美等西方国家对于二战的贡献，几乎不提苏联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贡献。同时，他们无视中国抗战的自主性和长期抗战的战略意义，贬损中国的作战能力，夸大外国援助的作用，致使“美援决定论”等错误认知大行其道。对于这些历史虚无主义的错误观点，我们必须全面检视和坚决批驳。

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是坚持正确二战史观的实践要求。二战的胜利，不仅宣告了法西斯集团彻底的军事失败，更是对和平、正义、人道等人类共同价值的确定。《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等一系列具有国际法效力的文件确立的战后秩序，形成了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强调主权平等、领土完整、反对侵

坚持正确二战史观

□ 刘本森

略和干涉，是世界各国和平共处的根本保障。当前，一些西方大国出于战略竞争需要，试图打破这种秩序，重新塑造有利于自身霸权的规则体系。原本经过战后纽伦堡审判、东京审判的历史定论，遭到了淡化、漠视，甚至是篡改。这些歪曲二战历史、挑拨矛盾、制造分裂的做法，意在削弱二战胜利国的合法权威与历史正义，挑战二战胜利后确定的国际秩序。对此，我们必须旗帜鲜明地坚决维护《联合国宪章》第一百零七条的“敌国条款”等内容，防止法西斯残余势力卷土重来，反对任何美化殖民侵略的错误观点，坚决捍卫二战胜利成果及其确定的法理秩序。

加强正确集体记忆的塑造和国际传播是坚持正确二战史观的战略途径。随着时间的推移，关于二战的记忆已经突破了个人记忆、亲历者记忆，成为一种被建构起来的集体记忆和社会记忆。在塑造二战集体记忆的进程中，中国要积极主动建构二战的自主记忆体系，提升二战话语权，大力弘扬正确二战史观。正确二战史观的塑造不仅依赖于专业研究，更需要全民的历史认知基础和强大的国际传播能力。坚持正确二战史观，必须从源头上加强历史教育，特别是青少年群体的历史启蒙，突出反法西斯精神与中国人民伟大抗战史实，并在学术研究中加强国际比较视野与跨文化研究能力。同时，持续推进国际传播话语体系建设，讲好中国抗战故事，把正确二战史观传递给全世界，使国际社会更广泛地了解、接受并尊重中国与世界各国一道为反法西斯战争所作出的伟大贡献。

以史为鉴共创未来是坚持正确二战史观的目标指向。坚持正确的二战史观，最终目的不是停留在对历史的回顾上，而是为了汲取教训、更好地开创未来。中国作为战胜国和联合国创始会员国之一，始终主张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坚定捍卫战后国际秩序的权威性和严肃性。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成果和国际公平正义”。当今世界，坚持历史真相、弘扬反法西斯精神，具有更加深刻的现实意义。二战的教训警示我们：团结合作、尊重主权、反对侵略，才能维护持久和平。只有坚持正确二战史观，以史为鉴，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成果和国际公平正义，世界各国才能携手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美好未来。

